

潘立勇 著

宋美人玉情神谕

审美人文精神论

潘立勇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审美人文精神论

潘立勇 著

责任编辑 周庆元

* *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五古路20号 邮政编码 310027)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排版

浙江慈溪新元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 *

850×1168 32开 13.75印张 345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1—2500

ISBN 7-308-01846-6/B·025 定价：26.80元

审其人之精神、論

其事而知其性



这个世界对于我的意义，取决于我对
世界的感受；我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取
决于世界对我的认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潘立勇同志的又一学术著作《审美人文精神论》，由我校出版社出版了。本书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当代美学反思论”，第二部分为“朱子理学美学论”，第三部分为“理学美学与人文精神论”，共计三十多万字。从中可以反映潘立勇同志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成果，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勤奋而富有成果的。他请我为书作序，我就欣然答应了。

我是在几年前浙大成立美学研究中心时认识潘立勇同志的。他搞美学，对我们从事的计算机美术及其对美学和艺术的影响有浓厚的兴趣，科学与艺术的交叉使我们对一些问题开始了讨论。有一次，《文艺研究》编辑部约他写一篇关于“美学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的论文，他特来请我谈些体会与看法，我向他提供了自己的两篇有关形象思维和设计思维研究的论文。后来，他的论文发表了，有独到的思路和见解，对我的论文中的材料和观点也作了巧妙的引证与发展。

我曾看过他送我的有关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反思和科技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有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还获得中华美学学会颁发的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成果奖，反映出作者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探索深刻、见解独到。近几年他把精力集中在对朱熹和宋明理学美学的研究，并努力探讨中华人文精神及其对当代

人类社会的意义，而且获得了国家八五青年社科基金的资助。不久前，他把今年的六篇论文送给我，有六七万字，发表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中国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很有份量。在当今商品大潮的冲击中，能坚守校园学术阵地，坚持纯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科学意志。

浙江大学曾是人文荟萃之地，拥有悠久的人文传统，现在已发展成以理工为主，经管人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一流的新型大学。在以理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中加强审美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科技与人文是人类生存的两翼，前者着重解决人的物质生存，后者着重解决人的精神寄托，缺一不可。我希望我校的人文工作者能为恢复与发扬浙大悠久的人文传统作出努力与贡献。潘立勇同志还很年轻，正是干事业的时候，我希望他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在学术事业上作出更大成绩。

潘立勇

1995年9月15日

序二

潘立勇同志是治美学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在中西比较、古今贯通中确立美学研究的全球视野，并以此去把握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特征、症结所在，揭示其历史走向。这样的研究既具有反思意味，又显示着学术思路的现实针对性。随着社会生活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立勇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人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精神传达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他提出人的审美本质与生存状况决定着当代美学在科技领域的作用问题，并进一步考察了现代科技对艺术、美学的逼近与挑战，而这也启示了他如下这一点：审美活动与高科技如何相适应以致联姻，是协调世纪之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重要环节。

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立勇同志是偏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这使他对传统文化思想有较深的修养。在当前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人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平衡，有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是我们经常在思考的问题，而他就总爱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去找精神资源。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精神文明的巨大影响和最大贡献在于它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意义在于：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成天下，而中华人文精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风貌与精神动力，它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曾成功地塑造了理想人格，保持了社会关系和国人

心态的平衡；在世纪之交高科技的社会，对于解决人的精神寄托仍有特殊的价值。

以上两种学术关怀使立勇同志发现了美学与人文精神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是完全可以相通的。那么互通的桥梁是什么呢？

立勇同志转入了宋明理学的研究。

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独辟蹊径的。他认为：理学作为宋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为深广的主导性哲学理论与社会思潮，包含着对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关注与思考，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对美学与艺术问题的思考。因此在他看来理学体系除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教育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等内容外，还应该包括艺术和审美哲学。为此，他把朱熹这位在常人看来是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和美学挂上了钩，他深入地探讨了朱熹整个理学思想中的美学因素，梳理了二者一体存在的逻辑构架。随着研究的深化，他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体系中，儒、道、佛三家的美学思想均已得到极为深入广泛的研究，而作为集三家思想之大成、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期的最高思维水平的理学体系，其中的美学内涵或美学思路，却一直被人们否认或漠视，是不应该的。他抓住了理学与美学的一个共通宗旨，即通过对心理情感这个中介环节的调节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这三种基本关系，以追求人生与境界的自由。于是，他从朱熹扩展到对宋明理学中其他几位大家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大胆地第一个提出“理学美学”的概念，并为之理出三大特征，那就是本体论美学、功能论美学、思辨论美学；而表现在宋明理学美学中则存在着三大体系，就是朱子的理本体美学、张载、王夫之的气本体美学、王阳明的心本体美学。

就这样，理学美学构成了沟通美学与人文精神的桥梁。

而这正是立勇同志这部专著的学术思路，美学篇、理学美学

篇、人文精神篇层层递进的组合，则成了合作的理论构架。从这样一条思路的获得可以看出，这位年轻学者具有学术研究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从这样一个理论构架的确立则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思路是活跃而开阔的，知识是渊博的，思考方式是具有逻辑严密性的。所有这些，也正是他学术上成熟的标志。

当然，学术研究的成熟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一定是富有创新意味的；我坦率地说一句：在颇有一些人身上，这种成熟只能是知识综合的成功。但立勇同志不同，他有学术创新的激情，阅读全著随时可以碰到智慧闪光的见解。如对朱熹的“文从道出”这个命题的分析就是这样。人们习惯于把“文从道出”和“文以载道”看成同一个命题，其实这只看到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个命题还包含着朱熹对艺术的形而上本体的追求。“文从道出”的哲学基础是“用从体出”，体即本体，用即现象或功能。“文从道出”的形上含义又是：“文”必有“道”的本体，这个“道”既指道德之道，也指宇宙之道。因此这个命题含有形上追求意识，超越现象去追求本体的意识。这样的分析就属于有启示意义的创见。

我和立勇同志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共事八年，虽然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完全相同，却在研究人，特别是研究形上与形下辩证统一的人上，有了相通之处，因此常常一起交流学术心得。他强调在扎实的基本功上展开思辨，作学术领域的客观审视，这点也和我有共同的语言。他思路敏捷，视野开阔，积累也较丰厚，讨论起学术问题来，往往旁征博引，进行大面积的综合概括，从中提炼出理论规律，这样一条踏踏实实的治学路子也使我很赞赏。这使我常常想：《审美人文精神论》的出版，不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就其学术品位来说，也是很合乎浙江大学一贯提倡的求是学风的。

因此看来，这本著作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更有意义了。

骆寒超

1996年秋·浙大中文系

目 录

序一.....	潘云鹤(1)
序二.....	骆寒超(3)

上编 当代美学反思论

第一章 美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反思与展望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现状之反思	(3)
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走向之展望	(19)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主体症结再探讨	(37)

第二章 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审美与科技

美的本质与生成再思考	(46)
科技美学的学科性质	(57)
科技美学中的主客体关系	(65)
美学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	(78)
现代科技对美学的逼近与挑战	(89)

第三章 美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审美与自由

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	(97)
审美与人的现实自由	(109)

中编 朱子理学美学论

第四章 朱子的理学美学的研究价值与背景

- 朱子理学美学的研究价值 (129)
朱子理学美学的社会、人格及思想背景 (142)

第五章 朱子艺术哲学的基本构架

- 朱子的艺术本体观 (171)
朱子的艺术特征观 (182)
朱子的艺术理想观 (193)
朱子的艺术修养观 (204)
朱子的审美鉴赏观 (214)
朱子的审美教育观 (232)

第六章 朱子理学美学的特色与影响

- 朱子、黑格尔艺术哲学本体之比较 (247)
朱子艺术哲学的特色及影响 (261)

下编 理学美学与人文精神论

第七章 理学与美学

- “理学”与“美学”的概念 (275)
“理学美学”的内涵与特征 (288)
理学家的人格审美理想 (306)

第八章 张载与王阳明

- 张载的气本论与美学思想 (314)
阳明的心本论与美学影响 (324)

第九章 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

中国文学意识的自觉	(342)
中西求索意向之异同	(350)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美育精神	(368)
中华人文精神的全球视界与当代价值	(377)
存在、感受与中华人文精神	(394)
后记	(423)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思潮风靡全国,对当时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那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对这些思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尝试着用它们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很快就发现,这些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来说,似乎并不太适用,我逐渐觉得困惑了。

我是在十几年前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中心时认识到了孙晓奇的。他那时还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硕果累累,是当时文学和艺术的批评家。他那句质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评家不是对文学和艺术的批评,而是对批评家的批评。”从那时起,孙晓奇的艺术批评就一直是我们对一些问题耳濡目染、耳闻目睹的。他那句“批评家只有批评自己的批评”的话,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对我影响很大,也给我提供了自己研究的方向。

孙晓奇比许多北大很多学者都早进入古代文学中心时认识到了孙晓奇的。他那时还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硕果累累,是当时文学和艺术的批评家。他那句质朴的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评家只有批评自己的批评。”从那时起,孙晓奇的艺术批评就一直是我们对一些问题耳濡目染、耳闻目睹的。他那句“批评家只有批评自己的批评”的话,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对我影响很大,也给我提供了自己研究的方向。

上 编

当代美学反思论

第一章 美学研究在当代 中国：反思与展望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现状之反思

繁花几度、众趋若鹜的“美学热”已理所当然地渐趋平息，抚今思昔、对镜自省的“美学反思”正势所必然地悄悄兴起，沸腾的议论转向了沉静的反思。诚如不少有识之士所言，这意味着我国当代美学研究正向纵深发展。^①沉静意味着深沉与成熟，意味着新的美学起跳前的思维准备和能量凝聚。这是历史的必然。

无庸讳言，沉静本身也蕴含着某种困惑甚或忧虑，这是美学发展陷于某种困境或令人感受到某种危机的反映。仅从如下的一些标题中，人们便不难感受到这种沉思中的忧虑或忧虑中的沉思：“困境不可逃离：走向现代美学道路上的理论自省”^②，“哲学美学的困境与美学的泛化”^③，“美学的危机和理论的张力”^④。然而，更令人不无忧虑的是，多数的美学研究者在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反思中似乎总是乐于总结成果与发展，而对中国当代美学在走向成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先天不足、某种似乎始终怪圈般地环结着

的困顿，没能给予必要的瞩目和足够的重视，往往点到辄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社的美学复印资料似乎也乐于报喜不报忧，上面所引的那类“忧患”文章只能见于未复印的目录索引。也许，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思者先天的理论成见掩盖了被反思对象的先天不足，而且反过来又将妨碍后者的发展与自身超越。如今，我们不仅需要对中国当代美学的现状作出反思，而且应该对反思本身作出反思，以寻找中国当代美学摆脱困顿自身的怪圈，实现新的超越的途径。

一、可观的历程

本文丝毫不想给中国当代美学可喜的现状与成果抹黑，诚如许多综述性文章显示的，中国当代美学从起步到发展，经复苏、过渡、中兴，再至繁荣，形成几次空前的“美学热”，思路步步开阔，研究步步深入，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与整个西方美学研究虽流派纷纭，然支离破碎、从者萧条的现状两相映照，更见中国当代美学的繁荣。在此，本文不妨先顺着有关研究的思路，对中国当代美学 40 年轨迹、10 年轨迹乃至近年焦点作个匆匆的累进式的巡视。

《四十年来我国美学发展的历程》^⑥一文把我国近 40 年来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949～1966 年，即从新中国成立到十年动乱前夕；第二个时期，从 1967～1976 年，即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时期，从 1977～1986 年，即新时期 10 年。第一个时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社会政治体制翻天复地的大变革总体同步，我国的美学研究经历了一个告别旧美学、创立新美学的大转折。后一阶段，在“双百”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经过自由热烈的研讨和争辩，逐步形成了四大美学派系并存的结构形态。第二个时期，美学研究为一股逆流控制，着重表现为唯心主义实用美学观。